

戈公振新闻时评与舆论观论略

蔡 斐

(西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戈公振在上海《时报》任职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时评。这些评论,聚焦时政,关注商业,关怀民生,抨击时弊,跨越五四运动前后两个时代,论题更为宏观,更为底层,救国情怀和民生意识更为浓烈。同时,经由包括新闻时评在内的新闻实践,戈公振形成了自己典型的民本主义舆论观。

关键词:戈公振;新闻时评;舆论观

中图分类号:K2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0)02-0046-04

作为《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的身份一直与中国新闻史紧密联系。或许是《中国报学史》影响太大的缘故,若干年后学界对戈公振的考察往往难以超越史学领域,他的一系列其他成就很容易被忽视,很少有人从事过专门研究。戈公振的新闻时评就属于此类被忽视的领域。2013年9月,江苏东台学人朱兆龙先生编著的《戈公振时评》一书正式出版。该书对戈公振先生在上海《时报》任职期间写作和发表的时评1791篇进行整理汇编,为学界系统研究戈公振时评提供了基础性素材。

一、戈公振新闻时评概况

时评起源于1903年梁启超改版《新民丛报》,至狄楚青创办上海《时报》时发展壮大,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时评家就是《时报》主笔陈冷(景寒),所以,很多时候学界也认为时评起源于《时报》。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狄氏灰心武力运动,乃创办《时报》,为文字上之鼓吹。延陈冷为主笔,独创体裁,不随流俗。如首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1]133}《时报》对时评的重视,从《发刊词》的专门介绍就能看出,“本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

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实之趣味,助读者之常识。”短短几十个字,明确了时评的题材与意义。显然,这是一种旧时新闻的“快速助读”。^[2]胡适在1921年所作的《十七年的回顾》也曾评价说,“《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用简短的词句,用冷峻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工夫去地思考索。”^[3]

戈公振1914年进入《时报》工作,从校对做起,后升任助编、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其间有10年时间参与时评写作。戈公振时评明确署名的日期是1915年1月1日。当时《时报》每日出版两大张四个版,包括三个新闻版,一个副刊版。新闻版有三个“时评”专栏。“时评一”作者为陈景寒,笔名陈冷、冷,负责国内要闻版;“时评二”作者为包天笑,笔名笑,负责地方新闻版;“时评三”作者为戈公振,署名“公振”,负责本埠新闻版。据考证,1914年的“时评三”无署名,但从前后语言风格和论述基调来看,也应出自戈公振之手。有可能是1915年《时报》社明确戈公振的编辑职权后,他才开始署名。从1915年1月1日开始,“时评三”一直是戈公振的专栏,基本上每日一篇,很少间断。据统计,1915—1921年间,戈公振撰写“时评三”总计1723篇,计216283字。

收稿日期:2019-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6BXW08);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2018ZDKAZ02)。

作者简介:蔡斐(1982—),男,江苏东台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新闻史学。

戈公振的“时评三”,秉承了《时报》时评“以公为主”“以要为主”“以适为主”的一贯风格,即文章短小、标题简明,一般一事一议,就事论理,议题注重新闻性,观点彰显鲜明性。往往寥寥数语,能将“文言文的简练、白话文的通俗、古代杂说的睿智、西方随笔的思辨,糅合在短小精干的时评中”。^[4]

与此前每天一篇的写作量不同,1920年,戈公振的“时评三”只写到当年的5月31日,1921年的“时评三”只写到当年的2月21日。

出现这种断裂,与戈公振在《时报》的工作变动有关。1919年9月6日前后,戈公振接任《时报》总编辑一职,负责主持全报编务,主管头版要闻专电的编辑,同时还要代行经理的职责,负责报馆的经营和《时报》大楼的修建。1920年下半年,戈公振接受《时报》资助,晚间前往青年会补习英语。同年7月9日,戈公振在《时报》首创《图画时报》,刊登大量照片与图画,推动中国报业从“石印时代”走向“铜版时代”。这些事情,耗费了戈公振大量的精力。于是,“时评三”改由他人续写(署名“太素”),戈公振从1923年11月9日开始负责头版《一周国内外大事纪要》。

《一周国内外大事纪要》也是时评的一种形式。与“时评三”一事一议的形式不同,它侧重于一周内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的罗列汇总,评论要素相对较少,强调以事取理,力争事理皆彰,多属于事件述评和形势述评性质。据统计,戈公振在1923—1925年共撰写“国内外纪要”68篇,计66449字。

二、戈公振新闻时评的关注点

戈公振新闻时评的创作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波谲云诡的年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后,迎来了辛亥共和。当知识分子欢呼雀跃以为新时代到来之际,却发现时代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也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反而陷入军阀混战,民众依然困顿的境地,这引发了包括戈公振在内的新文化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前途的探索和辩论,遂有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时评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作为思想的原声、媒介的旗帜和理念的引领,形成了五四时评特有的风格。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戈公振时评无论在思想形态,还是在语

言风格,都在通达五四时评的路径上,但其视野更为广阔,跨越了五四前后两个时期,其论题更为宏观,更为底层,救国情怀和民生意识更为浓烈。

1. 聚焦时政

戈公振时评,与全国政治形势联系密切,往往依时而动,有感而评。从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纪年为“洪宪元年”到3月22日取消帝制期间,戈公振的多篇文章如《党人行动》《兵燹》《华盛顿生日》《战事与商务》《杨晰子》直指袁世凯历史丑剧给国家民众带来的危害。袁世凯去世后,戈公振又发表《除旧布新之希望》《民意》《庆祝共和》《党派》等,表达对共和制度的向往。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溥仪称帝。面对中外舆论的哗然,戈公振自7月2日起每天发表一篇评论,如《复辟与商业》《反对复辟》《实力》《安平轮沉没》《欢迎伍总长》《伪》《复辟声中之炸弹》等,痛斥复辟的倒行逆施。1918年,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戈公振先后撰写了《避兵》《战事与借款》《和平》《运兵》《息战》《服从中央命令》等近90篇时评,抨击军阀为一己私利置国家和平于不顾。1919年,五四运动和南北议和成为戈公振时评的重要论题。戈公振在五四运动中发表时评《国民大会》《学生联合会》《敬告工人》《上海学界之责任》等40余篇,不断结合运动的新趋势总结斗争经验,鼓舞爱国学生,启发市民觉悟,并公开将当时社会通称的“五四风潮”称为“五四运动”。南北议和期间,他又发表《劝双方让步》《和议之前途》《和议代表之责任》多篇评论,公开劝诫双方以国家大局为重,泯去无谓争执。

2. 关注商业

戈公振时评,与全国商业形势联系密切,往往应时而作,议论生风。《时报》作为当时中国第三大中文商业报纸,^[5]对商业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戈公振有关商业的时评大抵有以下几类:一是论说商业总体态势的,如《商业之衰落》《商业之生机》《商业上之发展》《呜呼,中国之商业》《商界总联合会》。二是论说商业与时局的,如《时局与商业》《欧战与商业》《防务与商务》《商务与报纸》。三是有关商业各领域的,如《棉纱业之发展》《大宗之丝运法》《西药同业公益会》《告米商》《告电灯公司》《茶业停滞》《张裕酿酒公司》。四是有关华商国货的,如《国货与华侨》《中华国货公司》《提倡国货》《国货加价》《华商为愧多矣》《华商其猛省》。五是有关各类税收政策

的,如《反对洋货落地税》《印花税》《加征货物税》《裁厘加税》《修改印花税》《公卖税》。总体来看,戈公振的商业时评涉及面广、反思度深,常常能够站在民族工商业的立场,倡导商业兴国,呼吁实业发展,反对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特别是他多篇提倡国货的时评,不仅是把民族主义融入了新兴消费文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提倡国货为国民分类事”,否则“吾国工业不行,驯至日用物品仰人供给。利权外溢其害小,不能自立其害大”,^[6]这是典型的国货运动背景下爱国主义情感的理性表达,无形中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

3. 关怀民生

戈公振时评,与社会民众生活联系密切,往往题材广泛,情理交融。如妇女方面,有《妇女生计》《缠足》《振兴贫民女子教育》《女子解放的问题》《妇女之新生计》《男女一同做事》;如教育方面,有《整顿小学赘言》《职业教育》《同济学校》《中学之改良》《聋哑新学校》《幼稚园》《盲童学校》;如劳工方面,有《失业工人》《人力车夫罢工》《再论人力车夫罢工事》《罢工》《小贩风潮》《黄包车夫风潮》;如救灾方面,有《赈灾》《为灾民呼吁》《救灾救溺》《俭食救灾》《避乱难》《天灾人祸》《恤灾》;如生活方面,有《米》《米禁》《盐》《呜呼,米禁》《米贵之痛苦》《米价飞涨》《物价》《自来水问题》。此外,还有《大雪与贫民》《吾民之负担》《电车碾毙乞儿》《小民之厄也》《市民权》《人口加增与卫生》《公园》《取缔医院》《为民食留余地》等诸多关怀社会民众生活方面的内容。这些以民生为论题的时评,大多情理交融,在析理入微之中渗透入作者为民众疾苦民生艰难的呼吁。戈公振时评中,“民苦赋税久矣”,“夫时局艱危,民生之困苦极矣”,“黄包车之风潮甫已,而小贩之风潮又至。要言之,均为生计问题所逼也”,“直隶之大水,与夫四川之兵祸,观于慈善团体之拯救不遑,即可知小民之罹于斯厄者众矣”,“白米价暴腾,贫民受害最烈”等语句随处可见,悯农惜民之情,每每流露于报端。

4. 抨击时弊

戈公振时评,与社会陋习丑态联系密切,往往切中时弊,饱含批判。戈公振抨击的时弊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各类匪患问题,如《吓诈与抢劫》《匪》《拿不尽之匪徒》《愍不畏法之匪徒》《盗匪游行街市》《兵与匪》《盗匪临街示众》《拐匪》《匪

患》,他希望通过这些时评,“愿有地方治案之责者,其深长思之”。^[7]二是官吏贪腐问题,如《官僚》《呜呼、污吏》《工巡局之腐败》《呜呼,“模范”警察》《敬告言搜刮之策者》,这些评论以事析理,直述“官僚之幸,民国之不幸也”。^[8]三是社会陋习问题,如《赌》《赌窟》《禁止娼妓》《禁止彩票》《严禁诲淫小说》等。其中,戈公振花了超过 80 篇的数量集中连续批评了当时烟土问题,如《烟灾》《鸦片》《烟禁》《私运土膏》《私土与匪盗》《戒烟》《私土充斥》《监视焚土》《除毒务尽》《呜呼,鸦片贸易》。他一方面指出“烟禁废弛,甚于前清……政府再不严厉进行,则民间虽有百拒土会,无益也”,要求政府在禁烟方面有所作为,^[9]另一方面指出禁烟必须做到“禁种、禁运、禁吸”的结合,“此应要求法庭重治其罪,一面社会亦予以相当之待遇,使其不齿于人类”,才能“拔本塞源”。^[10]这些评论,体现了戈公振与烟土问题斗争的韧性、感性与理性。

相比之下,《一周国内外大事纪要》的国内部分,也主要聚焦于国内政治、商业、民生与时弊等问题,但更偏重宏观时局,如军阀混战。国外部分则关注国际联盟、鸦片会议、外国政务等国际大事。行文风格上,以简述事件为主,在事件头尾稍做评论,达到阐明观点,揭示实质的目的,即以“述”为由,以“述”为主,以评“点睛”。

语言风格上,戈公振以凝练简洁的文言文为体,习惯通过白话文的明白晓畅将理性深刻的思考表达在时评短小精悍的方寸之间。十年时评中,“初时行文风格较为审慎稳妥,不露锋芒,点到为止;日久劝喻论辩,反讽正切,纵横捭阖,汪洋恣肆”,^{[4]5}形成了独特的戈氏风格。可以说,戈公振“时评三”的稳健遒劲,与陈景寒“时评一”的冷峻犀利,包天笑“时评二”的短峭活泼,一起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报纸言论革新的优秀代表。

三、戈公振的舆论观

在包括新闻时评在内的不断新闻实践中,戈公振形成了自己的新闻理论。对于新闻评论,素来坚持新闻本位思想的戈公振指出,“报纸虽以掲載新闻为主,然评论为意见之表示,亦未可轻视”,^{[1]195}特别肯定了新闻评论的地位,所以,他在《中国报学史》中开宗明义将报纸定义为“报告新闻,掲載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1]8}

“报纸为舆论之机关”是 20 世纪 20 年代前

后媒介对评论的功能定位,这也是当下中外新闻界的共识。那么什么是舆论呢?戈公振有自己的解释,“就是以大多数人之意志为依归”。^[11]这一解释有别于当代媒体强调的舆论引导。在戈公振的眼里,“记者之天职,与其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代表舆论”。^[12]他清晰地区分了“制造舆论”和“代表舆论”的区别,认为新闻与评论的任务是“代表舆论”,体现国民意志,并顺延推出记者在业务方面的作为,“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伪造。”^[12]这种论述,和20世纪初年前后的“制造舆论”和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指导舆论”相比,显现出典型的民本主义成分。

戈公振的舆论观,大大有别于此前传统儒家义理推崇的“清议”,也有别于王韬以来诸多政论文章,而是五四运动前后新式新闻学人的报刊思想。当然,这一舆论观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国民公意”说。这一点不足为奇。戈公振早年服务于《时报》时,梁启超和狄楚青是他思想发蒙期的导师。梁启超认为,“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13]这段话中,梁启超将舆论界定为“公意”,既点明了舆论的主体是公众,也指明了舆论的呈现方式是意见“公表于外”。戈公振的观点,“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者”,^[12]实际上是梁启超舆论思想的进一步延伸阐释,揭示了舆论、国民意志、报纸三者的联系。换言之,戈公振认为的真正舆论,是在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公共意志”。所以这种“公共意志”要求报纸必须有独立的立场,而不是依附于政治。进一步来说,戈公振的观点,则是将舆论、国民意志、报纸三者放置在新闻学科的话语体系下,回归到新闻本位和民本主义,摆脱了梁启超等新闻学启蒙者有关政治与报纸属于同一范畴的论说框架。

戈公振对于报纸评论的重视,固然源于他的编辑职责,更重要的是报纸舆论对国家时局的重要性。他在《中国报学史》里提出,报纸舆论功能的弱化是导致袁世凯封建复辟的重要诱因。“若当袁氏蓄意破坏共和之时,各报即一致举发,则筹安会中人或不敢为国体问题之尝试……虽曰其故甚多,而舆论之软弱无力,不可谓非一种诱因。”^{[1]183-184}所以,他特别强调,“一个国家,欲贯彻民治政体的精神,不能不希望健全舆论的生成。健全的舆论,又不能不以报纸为枢纽”。^[14]这种逻辑上的要求,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办报传统和职业理想在戈公振身上的体现,这也造就了他“五四”前后笔耕不辍的光辉历史。在“军事扰攘,岁无宁日”的历史关头,他认为“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报纸既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应摒除己见,公开讨论,俾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1]2}

如何让报纸的评论达到上述“公开讨论”的要求呢?戈公振提出了两个思路:一是评论的专业化。他指出,我国报纸在评论方面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在于我国报纸评论“多以编辑兼之,精神不能贯注,则敷衍塞责,亦固其所。”^{[1]195}对此,可以借鉴欧美大报设立“论说记者团”的方式来强化报纸评论。这里所谓的“论说记者团”就是媒体的专门评论员,也就是目前流行于各家媒体的“本报(台、社)评论员”。二是评论的参与性。戈公振最先认为报纸应该为普通民众提供发表评论的空间,将评论权从新闻职业群体扩展到普遍社会公众。他呼吁,“深愿主笔政者,今后能移易其眼光,开豁其胸襟,予平民以发抒意见之机会。”^[12]戈公振的这一思想,是一个极有远见的判断。十多年后,类似的观点才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表述为媒体的一种社会责任。

屈指算来,戈公振时评距今已约百年。重温他的文字,发掘这段被历史淹没的知识宝藏,为先贤继绝学,为学科增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下转第74页)